

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实践逻辑

——基于济南市的个案研究

刘万顺 刘 洋

摘要：本文运用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试图把握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实践逻辑。根据布迪厄四大资本类型将实践世界分析性地划分为经济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和象征世界，运用统一的数学语言和术语提炼出了四大实践逻辑：经济世界的非线性逻辑、社会世界的同心圆逻辑、文化世界的临界点或者拐点逻辑和象征世界的坐标系逻辑。

关键词：农民工 实践世界 实践逻辑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的研究起点

正如孟德拉斯所讲，“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H·孟德拉斯，2005：1）。短短 20 年来，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中国社会突生出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这一文化具象成为形塑历史的深层次力量。目前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已经有 1.2 亿人之多，在未来 12 年还要有两亿多人口将要转移出来，到 2020 年这一群体队伍将达到 3 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被很多学者看作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是把城市作为人生的“中转站”，还是作为“归宿”？来自农村的这些“庄稼人”在城市社会中进行着怎样的生活实践？他们在城市适应中有着怎样的生存策略？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演绎着怎样的历史？农民工群体如何才能融入城市社会？

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第一种视角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功能，提出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另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农民工流动和适应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李培林，1996；渠敬东，2001），这个视角是对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分析范式的应用，但是此类研究往往把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本位，一方面忽视了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忽略了农民工在社会关系网络运用中的微观逻辑；第二种视角认为农民离开农村融入城市社会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郑杭生、潘鸿艳，2006），这个视角将个体命运与历史的变迁勾连起来，体现了历史变迁对个体生活的塑造，但是这种宏观的视角忽视了个体生活史的连续性，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史并不是简单的“传统”、“现代”的断裂；第三种视角则从社会排斥和社会冲突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此种视角从政府制度排斥与城市社会的非制度排斥的角度进行了微观分析（李强，1995；蔡昉，2000；朱信凯，2005；刘万顺、李芹，2009），但是此种视角将农民工群体放在了与城市政府和城市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立场上，忽视和抹煞了农民工适应的生活智慧；第四种视角从实践社会学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进行了考察，比如符平（2006）从实践社会学角度提出了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四个世界，但是这种研究没有对农民工城市实践各个面向进行考察，更没有概括出农民工的实践逻辑；第五种视角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总括式的描述（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2006；郑功成、黄黎若连，2006），但是这种描述仅仅停留在一些静态的层面，对于农民工群体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缺乏分析力度。

以往的研究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病：第一，“唯智主义”的滥觞。以往的研究往往从理论出发，

将理论逻辑和框架强加于实践，用现实来说明和验证预先存在的假设，忽视了实践自主的逻辑存在，比如郑杭生等将现代化理论套用到农民工生活变迁分析中，把农民工生活变迁的逻辑简单化为“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第二，忽视了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考察。农民工经历的事件流都在生活世界中发生、延展和再生产，生活世界是农民工实践的主要场所，农民工在这里伸展生命的历史，实现自我的形塑；第三，把农民工放在被动客体的地位进行研究，忽视了农民工实施生活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对农民工在结构约束下的生存策略和生活智慧视而不见；第四，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将农民工生活整齐划一化，忽视了农民工实践逻辑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突生性；第五，已有的从实践社会学角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的研究，试图将农民工作为主体，分析其在实践世界中的“惯习”，但是并没有对其实践世界的主要面向进行深入考察，更没有提炼出其实践的逻辑与心智结构的变迁逻辑。

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扩展、制度架构容纳与社会结构开放的过程，更是农民工心智结构的变迁过程，通过对农民工心智逻辑的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本文从布迪厄那里借用“实践”的概念，试图探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实践逻辑，刻画农民工群体在实践过程中不同面向的心智结构的变迁逻辑。

我们将要回归经验世界，将经验世界作为知识创造的源泉，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去套用现实。正如布迪厄等提醒的，“被恰当理解的理论不应该与哺育理论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为理论持续指导和塑造的经验研究工作相互割裂”（布迪厄、华康德，2004：33）。

二、实践的内涵和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中，实践具有如下特点：（1）社会时空性：与静态结构不同，在实践过程中，社会时空性便出现了；（2）紧迫性：在社会时空性的限定下，实践便具有了紧迫性的特征，行动者的实践往往是在紧迫的境遇下的自发行为，不存在不受客观世界限制的清晰、线性逻辑体系，在紧迫的境遇下实践往往具有流变性；（3）前对象性和非设定性：实践在前对象性和非设定性的层面运作，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契合，在行动者设定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社会感受性已经在指导我们的行动；（4）独立性：实践并非完全按照结构性的规划来进行，而是相对于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实践具有独特的生成机制；（5）非功利性：行动者的实践展开并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过的目标的有意图、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而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6）总体性：布迪厄试图维持社会事实的总体性，反对把社会结构割裂开来，把总体性社会事实碎片化，破坏实践的逻辑。

在方法论层面，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社会学分析的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占据着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第三，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轨迹中，我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布迪厄、华康德，2004：143）。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世界由大量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组成，这些社会世界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客观关系结构，这些社会小世界的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可化约为支配其他社会小世界的逻辑和必然性。这些小世界就是场域，这些场域通过主导的资本类型来获得自我界定，在主导资本类型影响消逝的地方也就成为场域的边界。不同的场域由于不同的主导资本类型作用，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如“经济场域”、“艺术场域”等。

本文将采用实践世界来代替场域的概念。如果说场域是一个个的社会小世界，那么实践世界

就是社会大世界，社会的大世界由一个个社会小世界组成。实践世界是行动者所处的日常生活的空间，随着社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乡村、城市等），农民工的社会实践便在城市实践世界展开，而农民工的城市实践世界是由一个个具有不同资本形态的场域组成的。

行动者在实践世界中的实践，既受到实践世界结构的约束，同时也会在结构约束下采取策略性行动，利用掌握的资本和原则在游戏中追逐利益，希望能够在实践世界的分配结构中占据实际的或者潜在的优势。行动者采取的策略性行动受到在实践世界中获得的实践感进行引导和组织，策略性行动并不是以经过计算的目标为意图、合乎理性的组织起来并深思熟虑加以引导的行为，而是激发人们、驱使人们去行动的一种规律性的遵从行为。这种实践感布迪厄称之为“惯习”。惯习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布迪厄、华康德，2004：19）。惯习是社会结构内化到人身体中的产物，是客观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身体所处的历史结构内化到身体所形成的惯习，一方面具有文化堕性，另一方面随着身体所处的客观结构的变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惯习体现了主体与世界的统一，惯习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以一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方式来应对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境遇。

三、研究方法的运用和资料来源的说明

定量研究的方法往往能够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意义，但是容易囿于研究者所掌握理论假设和已有框架限制，导致根据应然的预设去套用实然社会现象的唯智主义错误。实践社会学正是要克服将理论逻辑强加于实践逻辑的唯智主义错误，因此我们将要采用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城市农民工生活具象和心理世界，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事件流和相应的应付策略。个案访谈的展开，我们采用悬置的态度，不先入为主，保持自己的无知者角色，暂时中止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自然态度，保持研究的反身性态度，我们回到农民工的生活经验本身，将农民工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的对象。

本文所采用的个案资料来自于笔者在山东省济南市进行的三次农民工问题专题调研，2006年10月在山东济南开展“外来贫困人口子女教育状况研究”专题调研获得30个个案访谈资料，2007年3月和7月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和市中区开展“城市农民工就业歧视探究”专题调研获得21个个案访谈资料，2008年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开展“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建构”专题调研获得15个个案访谈资料。

四、农民工在城市世界的实践逻辑

农民工在城市实践世界中进行实践，被嵌入到城市实践世界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在实践中不断地形塑自我，进行社会活动，开展社会关系，把实践世界的结构内化到身体内部，形成与社会结构具有本体性契合关系的人格特征、思想模式、价值观念、行动模式和生存策略，通过实践获得的不可明觉、模糊不定而又大体以一种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运作的“实践感”来应付生活，农民工靠这种惯习获得了城市生活的基础和前提。

实践世界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更是社会学意义上权力关系实践的政治空间和斗争场所，实践世界不仅具有物理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和时间性。实践世界空间的“二重性”使得实践世界中的行动者围绕着空间的再生产和重构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空间的“二重性”是指空间既是前提和中介，又是表现和结果；既是生产者又是产品。空间中的“强者”利用既定的优势地位来规划、规范和操作空间，“弱者”利用时间作为“弱者的武器”来抗争空间，希望在时间流动中来重构空间，实践世界也因此不是一个必然性的政治空间，而是充满着即时性和偶然性。

布迪厄提出了资本的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 1986），后

来布迪厄又在三种资本类型基础上，提出了符号资本的概念。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各种资本的占有和存在逻辑，即上述资本有着符号资本的形式，也就是三种资本的合法化形式。

实践世界是权力关系系统，这个权力关系系统外在于其所确定的社会行动者，对行动者具有结构的约束作用，但是并不能机械地决定行动者的行为。实践世界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把行动者构建为积极行动者，社会行动者拥有在实践世界中行为和游戏的特殊的知识、技术和禀赋，或者说是惯习，社会行动者利用其在实践世界中习得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借助于既定数量和结构的资本，在实践世界中展开策略性行为，试图维护或者改善其在既定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换句话说，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世界的结构约束下，借助于实践性惯习展开策略性行为，不断地争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因为正是这些资本决定着社会行动者在权力关系系统中的地位和境遇。

为了分析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世界中运用的策略和生活智慧，我们将社会世界按照四种不同的资本类型分为四个不同的世界，经济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和象征世界。四个世界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事实是总体性的，只是为了建构农民工实践逻辑的理论而进行的划分。其中对于象征世界的理解，有必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布迪厄认为象征关系行为是以否定他者的方式制造差异，并借此区分自己与他者的（朱伟珏，2008）。因此我们对于象征世界的分析集中在合法化、符号化的竞争上，不论是生活方式的比照还是利益的争夺都需要借助符号资本来增强合法化、支配性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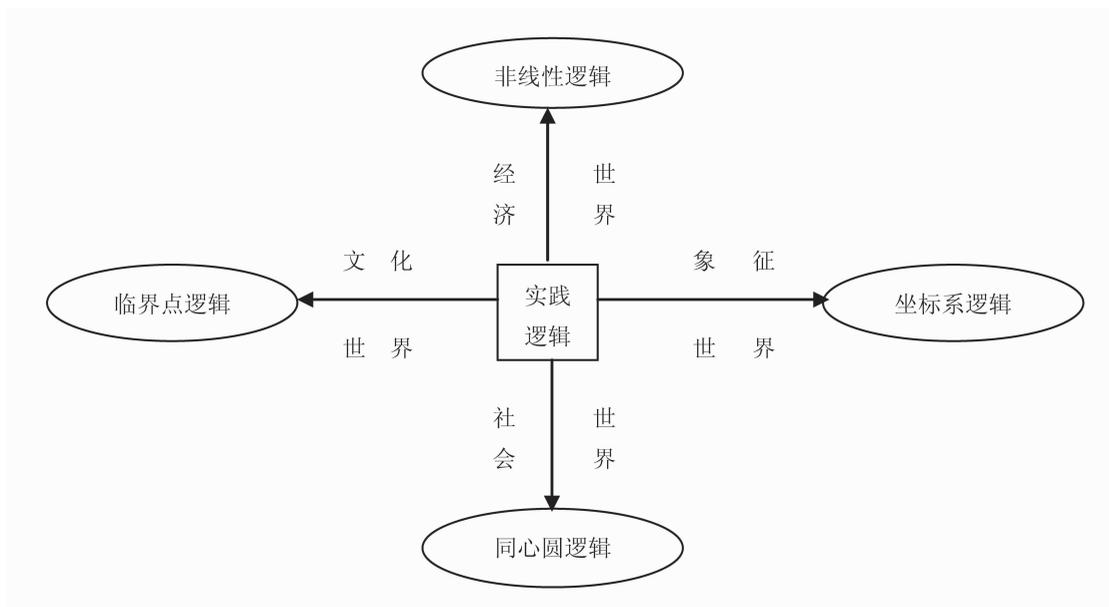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在城市世界中的实践逻辑

(一) 经济世界的非线性逻辑

对于农民理性的研究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争论。前者以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后者以斯科特和恰亚诺夫为代表。舒尔茨认为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家拥有相同的理性，他们也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刺激来利用各种资源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激励，农民就会点石成金”（西奥多·舒尔茨，2006：5）。斯科特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农民的经济行为坚持的是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原则，农民宁愿选择那些回报较低但是相对安全的经济策略，也不选择收益较高但同时具有较高风险的经济策略，“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詹姆斯·斯科特，2001：1）。

关于农民工经济行为的研究，基本还是沿袭了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争论。黄平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是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日常的开销的情况下增加收入，并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正如其书名所说的“寻找生存”，是一种生存策略和糊口逻辑（黄平，1997）；文军认为农民工的理性经过三个阶段，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文军，2001）。

那么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目标函数。在生存理性取向下，经济行为的产生源自于现有的经济条件不能满足于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或者降低消费需求，“勒紧裤腰带”使其消费行为适应现有的经济条件，或者增加收入但是等消费需求满足以后并不会产生进一步的经济行为，也就是“小富即安”，一切为了生存；在经济理性取向下，经济行为的产生源自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并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

第二，风险偏好系数。在生存理性取向下的经济行为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不冒风险，坚持代价的最小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在经济理性取向下，经济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敢冒风险，高风险、高回报。

第三，生产函数。在生存理性取向下的经济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为了得到一定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计成本的，比如黄宗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提出的“过密化”的逻辑，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无效益的扩展（黄宗智，2000：11）。在经济理性取向下的经济行为，要对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进行特意的盘算，实现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经济理性取向下的经济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我当时出来时候还非常年轻，当时就是想出来长点见识，学点东西。我刚来的时候，跟着别人干刮瓷，跟着别人干挣钱不是很多。后来我结婚以后和媳妇一块又来济南的，然后利用我的手艺在姚家庄那边修自行车，我媳妇卖学生用品。后来看到附近服装生意不错，就干这一行，我们上了以后生意就不好了，干了几十年也没挣着什么钱，我又开始干我的老本行，同时给一些汽车补带。现在城市里的电动车越来越多，但是修电动车的不多。从前年开始我又开始修电动车。”（Li, M, G, C）^①

我们从李氏个体户经济行为的变迁轨迹中，无法作出生存理性或经济理性的判断。李氏的经济行为从目标函数来说，既不是在生活压力下的消费驱动的选择，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下投资驱动的选择；从风险偏好系数来说，既不是安于现状的安全第一，也不会为了经济利益冒太大的风险；从生产函数来说，既不是不计成本的非理性行为，也不是进行过成本收益算计的理性行为。

我们发现很难将李氏经济行为置入“经济理性——生存理性”的线性序列之中。实践理性是对李氏经济行为轨迹所蕴含的行为取向更为合适的学术意义的概括。从李氏的经济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不断的选择和反复的尝试，虽然囿于经济能力和城市陌生环境的限制，也不愿意安于现状，宁愿冒点风险，打破生活的稳定，捕捉经济机会来寻求超越。因为城市生活的经验使他知道，在市场竞争激烈、制度障碍林立、人际关系冷漠的城市，一次机会的获得可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他从刮瓷工做起，然后凭着手艺自谋生路，之后又进行服装生意的尝试，服装生意的挫折使其重归本行，在此基础上抓住机遇开始从事电动车的修理。

每次选择既不是机械的反应，也不是出于有根有据的特别的盘算，是对变化了的环境，凭着累积的经验，稍经判断作出的选择，“想出来长点见识，学点东西”，“跟着别人干挣钱不是很多”，“附近服装生意不错，就干这一行”，“现在城市里的电动车越来越多，但是修电动车的不

^① 旁注（Li, M, G, C）中的Li是受访者的姓氏；M是性别（M是男性；W是女性）；G是职业（G个体户；J建筑业工作者；F服务业工作者；Z是制造业）；C是专题调研的序次（A第一次；B第二次；C第三次）。

多”，这些都可以看做其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的权衡估计，农民工的心智结构并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效用函数运作，而是在反复的尝试、不断的纠错。

实践理性在实践的过程中运作，指导行动对变化了的环境中作出合理（不一定是理性）的选择，通过实践的延续不断的得到再生产和重新的建构。如果说生存理性是非理性的，经济理性是理性的，那么实践理性是合情合理的，是行动者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出发，根据其习得的生活经验，对变化了的境遇作出的合理的选择，是行动者根据生活智慧在结构的约束下采取的策略性行动，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作出的选择和采取的策略既符合行动者所处实际的地位和处境，也是行动者所熟悉的并能够被熟练的掌握和轻松的驾驭，总之实践理性并不是按照既定规则来运作的，是一种“非线性逻辑”。

由于受自身能力、经济条件和结构的限制，农民工在做出合情合理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坚守生存的底线，与其说这是农民工对农民生存理性的继承，毋宁说是其在结构约束下作出的合理的选择，并不是农民工生存理性的表征。

“感觉从农村的劳动来讲呢，农村这几年也有改善。但是觉着不如到市里来打打工，更快一些，钱也不算少。但是，在家里想到外面来，来到外面以后我现在觉得还不如回家种地，在家里种地吧虽然说收入少，但是有保障，掉不了饭碗。因为干活‘准调’（注：及时）而钱不‘准调’。活只要你愿意干就有的是活，但是钱就不及时了。工资发放不及时。”（L, W, J, C）

从这位刘氏民工的话中，我们看到了其对城市打工生活的厌倦，产生了对回村务农种田的留恋，“在家里种地吧虽然说收入少，但是有保障，掉不了饭碗”，这并不代表刘氏民具有安全第一、安于现状的规避风险的观念，如果说是其坚持安全第一，也就不会到城市里来冒险，而是由于结构的约束，城市打工生活使其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超过了其承受能力，回乡种田成为其在结构约束下的合理选择。“因为干活‘准调’而钱不‘准调’。活只要你愿意干就有的是活，但是钱就不及时了。工资发放不及时。”

（二）社会世界的同心圆逻辑

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73）首先对求职行为进行了经济社会学研究，他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弱关系”纽带在个人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弱关系”纽带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搭桥，人们容易获得不重复的有价值的信息。

边燕杰（1998）在格兰诺威特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作为“强关系”的人情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人情关系不仅提供信息，更能提供实质的“影响”和帮助。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老乡、亲戚、朋友的“强关系”的纽带获得工作。

“跟着老板，我们老板都是那边的，跟着他干了很多年了，他到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去了。”（Wang, J, M, C）“老板是江苏的，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跟着江苏老板来这的。”（Liu, J, M, C）“我表姐在这，我就是通过这个关系来的。”（Li, G, M, C）

既然内群体结成的“强关系”纽带提供的信息重复性高，信息的价值低，那为什么对于农民工这个本身信息资源就缺乏的群体来说，把“强关系”纽带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呢？

这就需要对格兰诺威特的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格氏的理论内含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制度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行为是个人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自我选择，但是

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中，求职的过程中信息的获得固然重要，但是关系提供的实质的帮助和影响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求职先求人；第二，格氏理论强调了信息的价值，但是行动者对信息的选择不仅仅依赖于这个指标，信息的可靠性、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的可利用性是另外三个重要的指标。信息的可靠性是指行动者认为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信息值得信任，当然信息实际上可能是假的；信息的可获得性，是指一方面信息的获得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行动者对信息的获得途径比较熟悉，容易操作；信息的可利用性，是指获得的信息符合行动者的实际需求，如果超过了行动者的实际需求，信息本身的价值再大，对于行动者来说也是无效的信息。

“我们不愿意通过什么中介找工作，我们合适的工作不多，同时还要交那么多钱，整个就业如果能顺利实现的话，需要交纳求职登记费、成功录用费、招工手续费，等等，而且往往存在很多“打水漂”的时候，我还是更愿意通过亲戚找，有个熟人好说话。”(Zhang, M, J, B) “有些中介骗人的很多，我们不相信。电视上整天报道，很多都是骗人的，开始的时候说每月一千三、一千四，等你去了就不给你了，能给你一千就不错了。”(Chen, M, J, B)

市场中介、新闻媒体等属于“弱关系”的力量，这种弱关系的力量可能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受到惩治，市场中介、新闻媒体等信息提供机构在利润刺激下，传播虚假的信息，造成了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看重的不是信息的重复性和价值，而是可靠性程度，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这些天然的社会关系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亲缘关系存在着义务性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说，亲戚不仅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而且如果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还要承担道德责任。地缘关系虽然没有亲缘关系那样的情感、义务色彩，但是“差序格局”是中国人际关系的主要逻辑，人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由里向外、由近及远展开社会关系，“同一村落”、“同一乡镇”、“同一县市”依次展开，生活在同一空间的老乡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说，人际关系服从的不是互动逻辑，而是空间逻辑。

对于农民工来说，通过在城市工作的亲戚和在外打工的老乡获得信息，几乎是把其在农村对城市的憧憬变为现实的唯一途径。不流动的、稳定的、单一的和可预期的乡村生活把每一个人都嵌入到彼此掌握完全信息的熟人关系网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守望相助”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的行动逻辑。在这种行动逻辑中每个人都获得了生活的稳定，每个人都适应了熟人关系的人际交往，当面对变化的环境时，也要从传统中挖掘资源。乡村人际关系的行动逻辑作为内化到身体中的惯习在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依然发挥着作用。我们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人际交往的范围几乎仍然限制在老乡、亲戚的圈子里。由于彼此有着共同语言、人生经历、阶层背景和生活方式，容易形成有凝聚力的、亲和的人际关系，这种“强关系”的人际关系圈子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的生活提供了感情的依托、资源的支持和信息的平台。

“你现在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找我表姐，所以在这里我就亏了我表姐了。我在轻工业学院那边卖自行车，当时收了一批二手车子，觉得就是收了一些旧车子，也没什么。后来呢，公安局的找上来了，那个偷车子的逮住以后领上门来了，我当时差点拘留。多亏了我姐夫在经管学院里面当保卫科长，这样最后花了点钱就摆平了。我们平时走动的也多，我表姐也会经常给我孩子买一些东西，把他们不愿穿的衣服了什么的给我们。当然我们也很感激她，她妈也就是我姑在生病的时候，我们照顾的都很好。关系都要有个来回点嘛。现在就是亲戚如果没有走动的话，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就要长走动啊，人家帮我们这么多，我们也尽量能做点什么。我们回老家带点东西回来，就带给我表姐。”(Li, M, G, C)

“老乡对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样出来打工是很辛苦的，这里我们又人生地不熟，

没有人帮你的话，简直是寸步难行啊。我这个工作就是老乡给我介绍的嘛。不管怎么说，‘在家里靠父母，出门就要靠朋友’，大家是老乡，毕竟亲近些，一般像找工作了、生活上遇到困难了什么的，老乡之间就会帮忙。”(Ma, W, F, C)

对于在城市漂泊的农民工群体，强关系形成的内群体既是感情交流的依托，更重要的是资源与利益交换的平台，因此资源与利益的交换关系的平衡是维护内群体关系稳定的支柱。

“我是安丘李家的，我原先呆的地邻居也是安丘的，我们两家一个县但是不是一个镇。这在家里不算什么，可是在济南不同啊。毕竟是从一个地出来的，我们平常相互照顾的很多，我们家做点好吃的，也叫他过来。这个门面是我租的，他刚来时候穷啊，他修表我就把我门口的地方借给他用，不收他钱。你问问谁愿意堵住自己门口啊，但毕竟是老乡嘛，照顾一下。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个人不可交，太细作（注：斤斤计较），勾勾比比的。包顿水饺，让我们去吃吧，全包了些白菜梆子，怎么吃啊？干什么事就老想赚便宜，哪能这样。后来我们挪了地以后，又来往了几次，这个人做事不行。那天打电话来请我对象喝酒，我想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来的时候，就拿了四瓶啤酒，两包花生米。你说这算什么事，最后还是我对象请的他，咱不是为了那点东西，关键是做事不行。”(Li, W, G, C)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内群体关系网络与其说是感情交流的纽带，倒不如说是农民工群体在约束条件下，获取资源的生存策略。正是由于内群体资源交换的重要功能，当资源交换关系出现失衡以后，就会出现关系紧张与不稳定。

我们发现，农民工在与老乡、亲戚“这些强关系”纽带结成的内群体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同时，对城市世界却在消极回避，对城市的人际关系态度漠然。

农民工城市生活经历使其学到了应付城市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知识、策略和技术，并作为生活智慧和技巧沉淀为农民工的经验储备，当遇到相同或相似的处境时，农民工就会调用已有的经验储备来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并寻求相应的应对策略，这些知识、策略和技术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伴随农民工经验积累和反复不断的尝试、修正和创新得到再生产和重新建构。

下面是我们访谈中一位民工认为是其来到城市以后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坐车出去。在车上，有个神经不好的人坐车，在车上买票的时候拿出一张外币来买票。当时，售票员说这不是人民币，我们只收人民币。问他这个钱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他大爷（注：大伯）给他的，他大爷在台湾。然后又拿出一扎外币来。然后在这个时候，车上有人说我是银行的，拿出一个证件来确实是银行的。他就问那个神经病的人要过一张来一看说是美元。然后都要大家和他换，说是美元100对800。然后他主动拿出200块钱换他那个100美元。这时候车上也有几个人和他换。我们都没见过什么是美元，看到200人民币换100美元不是赚600吗？这车上那个带证件的银行的人不是说是美元吗？再说车上那么多人已经和他换了，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们也和他换了。最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团伙的，合伙骗人。现在这个社会处处都是陷阱，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欺诈，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像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都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很容易被骗，我们出来打工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都不敢和陌生的人打交道，老是怕被骗，‘吃一堑长一智’吧。”(Dai, M, J, C)

城市中的被骗经历，丰富了这位民工的社会阅历，“吃一堑，长一智”是这次受骗经历对他产生影响的概括，同时使他学会了应付城市生活的知识、策略和技术，“现在这个社会处处都是陷阱，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欺诈，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像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都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很容易被骗，我们出来打工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都不敢和陌生的人打交道，老是怕被骗。”同时“现

在这个社会处处都是陷阱，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欺诈，没有任何诚信可言”成为这位民工对城市人际关系的“刻板印象”，这种“概化他人”的形象和“刻板印象”自然会影响他对城市人际关系的认知、评价和行为。

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实质的意义。农民工在城市中很少参与公共生活，城市世界与其生活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个“二元隔离的世界”。由于频繁流动的生活，对于漂泊的农民工来说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建立起稳定的城市人际关系。

我们发现农民工也并不是永远固守在亲戚、朋友封闭关系网络之内，对城市的人际关系采取一味的消极回避态度。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即使拥有人力资本，没有关系一样找不到工作，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社会关系的辅助，经济——技术理性也要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因此一有机会他们也会积极去建立、维护、经营和利用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我原来在绿化上来。在绿化上呆了三年，后来绿化上减人，把我们齐河的队伍减下来了。没减之前，我在绿化上就和这个老板认识了。我们在绿化，这个老板搞道路的治理。我就问他，你们那个地方一天大约多少钱？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一天不下30。绿化钱少，一个工管吃20块钱。我就问他我去行不行？他说行啊。”(Liu, M, J, C)

这种积极开拓的新人际关系网络是亲缘、地缘关系的延伸，主要是形成新的业缘关系。这位刘氏民工先是跟着同村的老乡来到城市从事绿化工作，在绿化工作的过程中，因为工作的便利结识了一位道路修建工程老板，通过这种业缘关系，刘氏得到现在这份工作。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的一般的行动逻辑：积极的利用已有的“强关系”纽带提供的信息，并为这种“强关系”纽带的维护和经营进行感情（频繁的人际交往）、资源（提供生活帮助）和信息（提供经济信息、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投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并不会因为先赋的特征具有天然的稳定性，资源交换的平衡是关系稳定的支柱。城市的生活经历使其对城市人际关系产生了消极回避的态度，但是农民工并不固守“强关系”的纽带，也不一味的对城市人际关系消极回避，也会在“强关系”纽带基础上开拓新的关系。如果说“强关系”圈子可以用“内群体”来概括，“城市人际关系”对其来说是“外群体”，那么建立的新的关系网络就是“内群体”的边缘地带，这三个地带大体呈“同心圆”形式排列。

（三）文化世界的临界点逻辑

孙庆歌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家长由于看不到教育改变子女命运的可能性已经对学生的教育投资失去了兴趣转而支持子女外出务工（孙庆歌，2003）。换句话说，农民在教育决策时候，表现出的是文化消费倾向而不是文化投资倾向，上学只是为了习得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以满足社会生活中的最为基本需求，而不是掌握谋生的专业能力。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义务教育便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大量的青年学生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便加入到农民工的劳动大军中。

在现实中，农民工在文化世界中的实践逻辑，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调查发现，农民工在文化决策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悖论。

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贬低：

“我们在工地上也慢慢学习焊工、钳工的技术。光出大力是不行的，要靠技术，有了技术就有钱。毕竟我们是年轻人，还要学一些吃饭的本事，现在的社会就是“出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出力。”(Wang, M, J, C) “如果学不好，还不如早下来学个技术，现在学个技术还很吃香。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很难，最后上了一顿子学找不到工作，那纯粹浪费钱，还错过了很多机会。你看我们邻居那个孩子，今年上了中华女子学院，上了半年就不上了，又花钱

跑到西安去了，这不是糟蹋钱嘛，有什么用。”(Li, M, G, C)

但当谈及流动人口的阶层差别时，却突出了知识在阶层分化中的作用：

“我是初中文化，像我这个文化程度的人，就只能在城市里下苦力了。像大学生，读饱了书，拿了各种文凭证书，找个满意的工作是很容易的，待遇好，生活的好。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只能找份工作勉强的维持生活，好的话能够帮一帮家里。”(Ma, W, F, A)

看到当今大学生就业面临的困境和技术工作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对于本来经济条件紧张的农民工家长来说继续供应孩子上学有很高的直接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应该让子女退出正统的教育体制学一门技术似乎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但是当谈及对孩子的期望时，大多数农民工却表示即使付出再大代价也要供应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子女退出正式教育体制学习一门技术和吃饭的本事是看到通过正统教育体制的文化投资改变命运前途无望作出的次优选择。

“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希望孩子能够好好上学，不要再像我们一样。现在上学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他上学，能往上走，我们就支持。我经常和孩子讲，要好好学习，不要像你爸一样长大以后再修车子了。”(Li, M, G, C) “其实我是尽力，他有能力念到什么(程度)我都会供他，我们再累我都会供他。”(Zhang, W, G, A) “我希望最好是读到硕士以后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很普遍了。到时候她学一个专长，研究得越细越精，对她往后的人生道路越有好处。”(Qian, W, F, A)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表面上悖论的现象呢？一方面是对文化的投资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当谈及社会的阶层差别和对后代的期望时，即使面临着就业困难的大形势和较高的教育风险又认为“上学是唯一的出路”。

农民工的意识结构中似乎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对农民工在文化世界的实践逻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临界点”之上，文化的投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超过“临界点”，就必须进行文化的投资和知识的积累，但是这种文化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当这种文化的投资不能换来达到“临界点”状态的结果，就是文化投资的失败。因为在“临界点”状态以下的层面，知识几乎没有价值，而技术更有实用价值。

农民工文化世界的实践逻辑正是这种临界点逻辑。为了便于分析，很有必要对知识和技术进行简单的比较。广义来说技术也在知识的范畴内，我们在这里是在狭义的范畴上运用知识这个概念，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知识。知识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就是在理解和解释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技术在“如何做、怎样做”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就是在操作层面上发挥作用；知识往往不能及时的转化为经济资本，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获得一定资格才具备价值，学生达到一定文化水平才能拿到学位，律师达到一定专业程度才能拿到律师资格证等等，而技术可以及时转化为经济资本，具有灵活的实用价值，如果说知识具有一种资格效应，那么技术具有学习效应；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脑力劳动的性质，而技术具有体力劳动的性质；知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专门学习、积累才能达到一定程度，而技术是边干边学的，获得知识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技术。撒列尼深刻的指出了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同：“分配给文化资产阶级的报酬数量不必然与文化资本的生产率成正比，知识分子获得权力和特权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文化，而不是文化的用途”(Szelenyi, 1982)。

麦德森(Madson)认为在中国关于社会成员获得地位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系统，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型工业化中国”，“第三世界”是指人们获得社会地位主要靠家庭成员、家庭背景或当地的干部——“土皇帝”；“社会主义中国”是指获得社会地位主要依靠在

官僚层次中的等级排列；“新型工业化中国”是指获得社会地位主要靠金钱（转引自：陈映芳，2006）。“第三世界”模式主要强调先赋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模式对于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都极为贫乏的农民工阶层来说没有意义，“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新型工业化中国”模式虽然也会受到既定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限制，但是即使继承性和封闭型特征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毕竟封闭型是相对的，封闭型与流动性并存，对于农民工来说也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希望自己后代能够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打破阶层的社会再生产，在结构约束的条件下，文化投资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上学是唯一出路”，即使文化的投资具有风险，也要去搏一搏，所以才会“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他上学，能往上走，我们就支持”。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人力资本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年民工要通过努力获得超出“临界点”水平的知识存量已经不可能，即使对于那些新生代民工来说，由于基础的限制、条件的约束和精力的不足，也很难通过文化投资达到超过“临界点”水平，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多学点技术，“技术才能改变命运”，“有了技术就有了钱”，通过技术来积累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的向上流动。

所以大多数民工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通过自己艰辛的劳动来激励子女努力学习，争取进入社会的上层，打破社会阶层的代际再生产，如果有可能也愿意承担代际流动的社会代价。“我现在有时候也把她带到我服务的家庭去，服务家庭里面也有和她大小差不多的小孩，我就带她去现身说法，让她看她妈妈做的这些活。山师那边的小高层也有（活），我就带着她上那去，那不是有好多的大学教授吗，看他们家庭的孩子怎么样，跟他们做交流”（Zhang, W, G, A）。

当发现通过文化投资实现向上流动无望时，作为民工的父母就不再去为孩子继续的文化投资，而是支持其退出正统的教育体制，去技术学校学一门技术，或是外出务工边干边学，习得一门“吃饭的本事”，通过技术的学习来不断的积累人力资本，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四）象征世界的坐标系逻辑

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大多都没有参加农业劳动，没有务农经历，根本不懂农活。城市的打工经历使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习得和接受了一些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会去上网。这是现代生活嘛，你们是不是也有 MP3 什么的吧，等我也去买一个”，也接受了城市世界的感官刺激，“城市是个花花世界，什么都有。”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碰撞，现代生活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的摩擦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差，“我们宁愿在外从事一些出力的活也不愿意再去种地”，现代性惯习和乡土性惯习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碰撞、冲突和摩擦，一些青年民工在回到农村以后会感到生活上的不适和紧张，“回家干什么都不方便，在家呆不了几天就想出来”（以上引用访谈：Li, M, J, C）。

一面是城市文明对青年民工的浸染，另一面是青年民工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对乡村文明的拒斥，城市生活方式甚至穿着打扮都成为其向村民炫耀的象征资本。“在城市里我们穿西服相对比较赶时髦，农村的衣服都是老土，我每次春节回去以后穿着新款的衣裳，村里人都比较羡慕我”（Ma, W, F, C）。

中年民工由于乡土性惯习在身体内的长期累积、固化，虽然不会产生向往城市文明、拒斥传统性文明的态度，城市文明也没有像对新生代民工那样的强烈的象征性意义，但是城市的生活经历和打工给他带来的经济利益，会产生令同村人刮目相看的象征性意义。“现在回去心情更好了，和村里人相比，我们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有，有这种情况。肯定刮目相看，看法不一样了”。（Mo, M, G, C）

但是他们无论是生活目标的设定还是生活方式的比较，都是把村民作为主要的参照群体。“因为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吧，没法和这里比，一般就是和家里比还可以吧”（Pang, M, J, B）。

他们炫耀的象征性资本只有以农村、农民作为参照坐标系的原点才有意义，他们所习得的城市性和现代性的惯习不过是使其在以农村、农民为坐标原点的坐标系的象限内，在既定惯习的路

径依赖作用下，发生位移和变动，他们所进行的象征资本排序很难跳出早年生活和演绎生命的乡土圈子。

一方面农民工自身在对城市文明向往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城市文明的厌倦，“在外面人生地不熟，也很难混，不如在家里稳定，城市里人际关系复杂，不好处理，没有村里那么简单，都是街里街坊的。现在大江南北到处走，哪里好就到哪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Gao, W, G, C），“在家里想到外面来，来到外面觉的还不如回家种地”（Liu, M, J, C）；另一方面由于结构的限制即使其对城市文明有着执著的追求和向往，但很难实现自己的“市民”梦，“对于我们来说，在城里呆住太难了，对我们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城市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个想象，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城市里这么多有钱人，对于我们来说在城市里生活的很艰难还不如回家好过”（Wang, M, J, C），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他们理所当然的把农村和农民作为参照群体。

农民工群体不仅在象征性资本炫耀中以农村、农民作为参照系，在对自身利益的符号化的争夺中也做同样的定位。

在自我利益认知上，农民工群体往往与农民身份进行比较，正如刘万顺、李芹（2009）所提到的，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是就业歧视存在的重要因素。

“因为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吧，没法和这里比，一般就是和家里比还可以吧。”（Pang, M, J, B）“我所在的单位老板经常说我们是民工，没有资格和条件跟他们拿一样多的工资，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处于低等的社会地位。”（Liu, W, Z, A）

当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权利侵害时，他们也是以农民、农村为参照群体来寻求象征性资本的保护，增强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程度。

在劳动过程中发生工伤事故等侵权事故时，农民工也往往以农民为参照群体，增强自己的利益的合法性，运用象征性资本寻求道义的支持。

“我们本身出来干活就很不容易，如果好的话谁出来啊。发生了事情，公司有责任了。”（Li, M, J, C）“要不是为了生计，为了家中的亲人，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呢。”（Dai, M, J, C）

贫困阶层在借助“中央”的道义政治权威方面，更有优势。那些认同于“弱势”身份、对国家提出“保障”“关怀”诉求的社会成员，更容易从“中央精神”中找到道义政治的支持（陈映芳，2006）。

“现在国家一直对三农问题这一块比较重视，不能欠农民工工资，从中央到省电视电话会议都重视这一块。”（Liu, M, J, C）“大的话，公司要解决了，该赔钱赔钱，该干嘛干嘛，他必须要负责啊，现在国家不是以人为本吗，重视农民问题，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也不敢逃避责任。”（Li, M, J, C）

在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从理论上说工人政治的激进化和国家试图推行的法制化是同步的，在此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公民意识不断兴起，法制化维权手段得到不断运用（Lee, 2002）。但是现实中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还是主要以农民为参照群体，寻求国家权威的道义性支持，为自己的利益增强合法性。

五、结论与讨论

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扩展、政府体制的吸纳与社会结构开放的

过程，更是心智结构的变迁过程，即农民工群体人格在转型过程中重塑的过程。通过对农民工心智逻辑的探讨，才能理解市场、制度等客观结构变化对于这一群体的意义。

农民工在城市世界中的实践，在与城市世界的互动中，在城市世界的权力关系的结构约束下，形成了特定的认知结构和应对城市生活的知识、策略和技术，这些知识、策略和技术作为生活智慧成为农民工的经验储备，在延续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再生产和重新建构。这些生活智慧，也就是实践世界所获得的惯习使得农民工城市生活得到不间断的建构，也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世界生活所依赖的基础，农民工在此基础上展开策略性行动，进行城市融入的不断努力和反复尝试，这也正是本文所探讨的农民工的实践逻辑。

我们根据布迪厄提出的四大资本类型，为了把握农民工的实践逻辑，把实践世界分析性地划分为经济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和象征世界，通过对农民工在这四个世界中的实践的分析，运用统一的数学语言和术语提炼出了四大实践逻辑：经济世界的非线性逻辑，社会世界的同心圆逻辑，文化世界的临界点逻辑或者说是拐点逻辑和象征世界的坐标系逻辑。

农民工在经济世界的行为逻辑，从目标函数、风险偏好系数以及生产函数等层面，都不能纳入既定的生存理性或者经济理性，他们并不是按照既定规则来运作的，而是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出发，根据其习得的生活经验，对变化了的境遇作出的合理的选择，是行动者根据生活智慧在结构的约束下采取的策略性行动，遵从的是“非线性逻辑”。

农民工在社会世界，积极地利用已有的“强关系”纽带提供的信息，并为这种“强关系”纽带的维护和经营进行投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关系网络。农民工在社会世界的人际关系编织是结构约束下获得资源的策略性行动，资源交换的均衡是关系网络稳定的支柱。城市的生活经历使其对城市人际关系产生了消极回避的态度，但是农民工并不固守“强关系”的纽带，也不一味地对城市人际关系消极回避，也会在“强关系”纽带基础上开拓新的关系。如果说“强关系”圈子可以用“内群体”来概括，“城市人际关系”对其来说是“外群体”，那么建立的新的关系网络就是“内群体”的边缘地带，这三个地带大体呈“同心圆”形式排列。

在文化世界，农民工的行为逻辑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强调，对知识的贬低；另一方面在谈及阶层差别时，却突出了知识在阶层分化中的作用。农民工的意识结构中似乎存在着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引导着农民工在文化世界的实践。在“临界点”之上，文化的投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超过“临界点”，就必须进行文化的投资和知识的积累。但是这种文化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当这种文化的投资不能换来达到“临界点”状态的结果，知识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而技术更有实用价值。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人力资本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要通过努力获得超出“临界点”水平的知识存量已经不可能，所以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多学点技术，“技术才能改变命运”。大多数民工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通过自己艰辛的生活来激励子女努力学习，争取进入社会的上层，打破社会阶层的代际再生产，如果有可能也愿意承担代际流动的社会代价，希望“知识改变命运”。当发现通过文化投资实现向上流动无望时，作为民工的父母就不再去为孩子的文化继续投资，而是支持其退出正统的教育体制，“技术才能改变命运”。

在象征世界，不论是符号的炫耀还是利益的争取都是以农村、农民作为参照系的原点。在与乡土世界的比照中，城市生活经历成为其炫耀的资本；在城市世界的利益争取中，农民的身份与话语又为其提供了利益认知与争取的工具。

我们通过对于农民工群体实践世界四个面向的考察，探究了其在这四个面向的心智结构与实践逻辑。我们对于农民工实践逻辑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民到何处去，或者说是城市化的去向”的宏伟议题，我们研究发现可能没有托马斯对波兰农民描述的那么乐观，“有许多波兰人——有一些是第一代移民——更多的是第二代移民——已经作为个体被美国社会所吸纳，现已或多或少地被完全同化”（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18）。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将会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即使各种客观的结构限制能够消除，历史形成的心智结构仍会在这一群体身上形成烙印，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着其价值态度与行为选择。而现实中大多数农民工又由

于各种结构的限制成为城市里的特殊人，一只脚在传统乡村世界，一只脚在现代城市世界，要真正的完成城市化的宏伟工程还需要国家和社会努力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消除既有的障碍，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会造就宏伟的历史。

参考文献：

- 边燕杰，1998，《找回强关系：中间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第2期。
- 蔡昉，2000，《中国城市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陈映芳，2006，《行动力极其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社会》第4期。
- 符平，2006，《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第2期。
- H·孟德拉斯，2005，《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平，1997，《寻找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出版社。
- 黄宗智，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社。
- 李培林，1996，《流动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强，1995，《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刘万顺、李芹，2009，《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制度排斥及非制度排斥》，《城市问题》第2期。
-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渠敬东，2001，《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载《都市里的村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孙庆歌，2003，《当代农村学龄青年弃学打工原因探析》，《青年探索》第6期。
- 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2000，《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
- 文军，2001，《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西奥多·舒尔茨，2006，《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 詹姆斯·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小农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译林出版社。
- 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
- 郑杭生、潘鸿艳，2006，《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探索与争鸣》第1期。
-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2006，《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第5期。
- 朱伟珏，2008，《象征差异与权力——试论布迪厄的象征支配理论》，《社会》第3期。
- 朱信凯，2005，《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第1期。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 Lee, Ching Kwan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u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31.
- Szelenyi, Iven 1982, "Gouldner's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as a Flawed Universal Class", *Theory and Society* 1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李春玲